

鄭振鐸



散文选集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郑振铎散文选集

陈福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郑振铎散文选集/陈福康编.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6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53—1

I. 郑...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87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陈福康

郑振铎是“五四”以后著名的学者、文学史家和艺术史家，大概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人们几乎忘了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尤其是一位毫无愧色的散文名家。从二十年代开始，他曾出版过《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及《民族文话》、《劫中得书记》等散文集。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未曾收集。一九五六年底，他曾打算把自己解放前未经收集的一些散文编成《灯火集》，并将《访书日记》整理出来；同时，打算把解放后写的一些散文编成《到处是花是春天》，把一些序跋散文编成《艺林杂话》，还打算再增写几篇游记

和读书笔记，以编成《考古游记》、《漫步书林》等散文集。可惜因为他太忙，后又不幸在出国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是《春天在呼唤》。是的，我们可以说，他一生所写的散文，篇篇都是为人类美好的春天而呼唤着的。

—

郁达夫说过：“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郑振铎的散文最鲜明的个性，是始终充满着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激情。象一条红线那样，爱国主义思想和进步的时代精神贯穿在他的全部散文中。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这里，我们仅举几个历史转折关头他的散文来谈谈。

首先是“五四”时期，即我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一开始得到重大发展并起了深远影响的，是议论性散文。即后来人们通称之杂文。从《新

青年》开辟“随感录”专栏起，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就写了配合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犀利有味的杂文，成为现代议论性散文的最初开拓者。而郑振铎在主编《新社会》时，从第四期（1919年12月）起也专设了“随感录”栏，并写作了不少杂文。可以说，他也是我国新文学家中较早创作杂文的作者之一。他早期写的随感录，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大多带着感情，富有文采。如《中国人与人道》，对笼统地说“中国人最人道”的说法表示异议，用“反话”的形式作了强烈的讽刺，且画出了旧中国血淋淋的现状。另一篇《天地人》，更全篇都是象征性的形象描写，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十分有力。这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型的杂文，他当时和后来还写过不少，大多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拥抱真理的激情。随着《小说月报》的改革（他参与）与《文学旬刊》的创刊（他主编），他又大量写作了另一类文艺杂谈型的议论性散文。《小说月报》从改革号（1921年1月）起，就辟有《文艺杂谈》专栏，《文学旬刊》从第二期（1921年5月）起，设有《杂谭》专栏，他都是主要撰稿人。他写的这类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

例如《血和泪的文学》一文，不仅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而且文章本身就是文学评论与抒情散文的结合，读了令人激奋。在这类散文中，同样贯注着强烈的爱国精神。

“五卅”期间他创作的散文，更是历来受到人们称赞。阿英认为，这是“五四”战斗的小品文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是特耀着光彩，飞扬着战斗的精神”（《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作者这时的散文，除了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外，还侧重于指出民众中的落后面。他的名篇《街血洗去后》，以质朴的笔调描述了在大屠杀后一个多小时的南京路上的所见所闻，表达了悲愤欲绝的感情；最后写到当夜他第二次又去南京路，却见到依然是灯火通明、店门大开、顾客拥挤，有的地方竟然还在开“游艺会”！文章临末笔锋陡然而转，又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是深深的思考。如果说，这篇散文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的批评还是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接着发表的《迂缓与麻木》、《止水的下层》等，则更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市民的麻木不仁。当然，作者在这些散文中对群众的某些看法也许不无偏激，但无疑是完全出于一

片爱国至诚。《六月一日》一文，记述了这一天的又一次屠杀，再次悲愤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暴行，描写了在人民的“眼中，脑中，红红的被屠杀者的血，是永远洗涤不去的。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这篇散文比《街血洗去后》写得更为激越而又深沉，文笔流畅生动，节奏铿锵有力，记事、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好。此外，作者当时还曾在以他为首编辑的《公理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性散文，达到相当高的思想水平。

收集于《海燕》中的几篇抒情散文，生动地记述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国时在船上的复杂心情与所见所闻。写法极细腻动人。《离别》曾在一九三五年被郁达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郁达夫同时指出：“且取他的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这说明这篇散文在依依惜别之情中蕴含着雄健阳刚之美；而更重要的，我认为郑振铎此文比起冰心当时的叙别离的散文来，具有强烈得多的爱国激情。另一篇《阿刺伯人》，写的是船到亚丁时遇见的丧失国土、受尽欺凌的阿拉伯人。作者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

先写了历史上曾给人类以“强大的战栗”的阿拉伯人祖先的英雄形象，也写了当时有关阿拉伯人专干劫盗之类的谣言；然而，作者亲眼看到的却是和善耐劳、备遭凌辱的阿拉伯人。作者看到他们被外国人殴打，“心中突感着一种难名的苦楚和悲戚”。这是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伟大同情，是作者高尚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在海外的流露，至今读来令人激动。

作者同时开始写的日记体散文，也是充满动人肺腑的爱国感情。在《欧行日记》的第一天里，他就写下了可与《离别》对读的一段话：“中国，我爱的中国，我们再见了！……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的，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而努力！”他在海外为祖国而努力，主要表现为发愤学习，充实自己，以便更好地回国工作。《欧行日记》虽然只保存有作者原日记的四、五分之一，文笔又相当质朴，却使每一个读者都深受感动。如作者在七月二十四日那天记道：“巴黎的四个星期，不过是如此草草的过去，时间不嫌得太浪费了么？！”“一点成绩也没有，愧甚！”甚至自责：“再不学，将奈何？”然而，从日记

中可知这四个星期他几乎是以全副精力扑在图书馆和博物院中学习的。这是何等严格和自觉的要求啊！八月十八日，他记述参观某个反映巴黎历史的博物院时写到：当看到法国“革命时代的巷战情形，那发狂似的民众的暴动情形，尤使我忆起了今年三月间上海的一个大时代”。在这朴素无华的字句底下，不正潜流着他对祖国的眷恋、对上海工人起义的怀念之情吗？爱祖国，必是与爱人民相连的。日记中满载着对国内亲友的深沉的爱，特别是深深怀念着“正用它们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国”的“勇士们”，甚至萦诸梦寐。例如，七月二十九日，作者写到梦见了瞿秋白，并深为其肺病而担心；八月二十三日，又梦见“玄珠”（茅盾），“我是天天为他担心着”，并“祝他是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大时代中过着呢！”这些描写虽然笔墨不多，却是十分感人的。

抗战爆发前后，他又写了很多政论性杂文，十分尖锐，也十分及时；然而大多文学性不很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学》月刊《前哨》栏发表的三篇杂文。虽因未署名而不为人提起，然而却都是文理并茂的佳作。《送旧中国入净火》一篇，

首引但丁《神曲》中的著名描写：“从‘地狱’升到‘天堂’，不能一步就跨上去，必须要通过一重惨苦的‘炼狱’。”文章以此比喻抗日战争是“一片炎炎的净火”，这火原是魔王放起的地狱火，但对于旧中国“却将发生以毒攻毒的效验，而尽着神圣净火的功用了”。文章连用了许多排比句，表达了对于祖国必将在“净火”中新生的信念，写得精练而富有哲理。《四维大张》一文，痛斥了汉奸电台对共产党的诬蔑，辛辣地写道：“说共产党泯灭纲常，不知礼义廉耻，这话少说也已有了十来年的历史，听起来倒也不觉新鲜，然而这礼义廉耻四个字竟会从那‘披发左衽’者的口里喊出来，我真不知管夷吾泉下有知，要作何感想！”文中还表彰了抗日的中国士兵及英国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礼义廉耻，以此再次说明抗战的“净火”可以“把我们民族的余垢逐渐洗涤，而使人类高尚的道德慢慢抬起头来”。另一篇《礼之用》亦是妙文，文章一开头说，“四维”中礼义廉耻一向被人平等看待，其实价值并不相等；特别是“礼”，决不能同其他三者同日而语。作者描写和讽刺了从前皇帝的“躬耕”之礼和民国时“长官”的“植

树”之礼，接着笔锋一转，揭露了当时救亡运动中国民党当局的虚伪礼仪，尖锐地指出：“礼”是“诚”之仇，对人民必须“相见以至诚”。“若平日视民若犬马，临患难而责民以执礼尽节，是缘木而求鱼也！”这样的优秀杂文，在抗战初期是不多见的。

抗战胜利后，他更以一个激进的政论家的姿态显身文坛。他发表了大量以抨击国民党当局反民主、搞内战和贪污腐化为主要内容的政论时评，其中不乏富有文采情志的篇章。例如，《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一文，是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南通血案”而作的，作者压抑不住满腔愤火，短促有力的句子象排枪一样喷射而出，读之震人肺腑，真可谓“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谢榛语）。再如《党和群》一文，既评论，亦抒怀，有激情，又形象。一开头便生动描写了自己的郁怒心情和幻想感，把反动派描写成一群乞食摇尾的狗；接着，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说明“党”在历史上是用来诬陷政敌的一个名词，但对内专横镇压的政权都没有好下场。汉有党锢之祸，但汉代江山也随着送终；宋有元祐党人碑之立，但

北宋也便为金人所灭；明有对东林党的镇压，但明帝国也不日覆亡。这对现实生活中反动派的反共行径不管是严重的警告。最后，文章说到现代各种各样的党都应运而生，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才可称为“党”，反之只配称作“群”——以私利相勾结的乌合之群。这篇文章的激情与文采，都远远胜过宋人的《朋党论》之类名文。

作者当时最有名的散文，是在《周报》上连载、后又出集子的《蜃居散记》。这不仅是描述上海沦陷时期人民痛苦生活的地狱相，日寇汉奸横行一时的鬼趣图，同时也是歌颂中华儿女英勇不屈的正气歌。在《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记复社》等文中，他满怀激情地描写了爱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受难和功绩。在这些散文中，作者从不表白自己当时如何；但我们在全书中，特别是《最后一课》、《烧书记》等文中，却深深地为作者的爱国斗争精神所感动。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作者一生中最好的散文集，也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散文界第一流的佳作。它不仅可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帮助人们认

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而且对于广大日本人民也具有生动的教育意义。因此，它一出版就被日本文学界翻译了过去。翻译者之一的斋藤秋男，在一九四七年就盛赞这些散文是“贵重的文章”，“具有亲切感人的魅力”，并认为《最后一课》“表现了‘殉道者的最后的晚餐’般的肃然悲壮”，《烧书记》则“可以见出幻影般屹立着的民族的不屈精神”。（《新中国人物传·郑振铎》）

二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极其渊博的学者。郁达夫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说过：他的知识素养“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因此他的散文必将“有着惊人的长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确实，深湛的多方面的学识，正是他的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并使其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读他的散文作品，往往令人如置身知识的高山大海，神游其中，流连忘返，享受高雅的情趣。他的散文中，社会历史、民俗风尚、海外奇闻、国内名胜、文物书画、史料考据、

小说戏曲、诗词名句等等，都被顺手摄来，织入文中，因而总显得流光溢彩，益人心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漫步于一般散文作家较少或难以涉足的领地。而且，他很早就开始写一些知识性极强的散文。

作于一九二五年，后被郁达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蝴蝶的文学》，就不仅文笔粲然，而且广征博引，从梁朝诗人刘孝标的《咏素蝶》到日本诗人的俳句，从庄子梦蝶的寓言到梁祝化蝶的传说，从《六朝录言》中的蝶变女子到日本《飞的蝶簪》中的冤魂化蝶，等等，或比较其异同，或指出其嬗变，让人领受无穷的趣味与启示。而且时有言简意赅的评鹭，如最末一节谈到唐明皇宫中逐蝶投宿，和《聊斋》中一个“罚令纳蝶”的县官受到“风流之小谴”的故事，指出前者没有什么意义而后者则带有人道主义精神，品评适当，颇有新意。由于此文涉及中外文学掌故不少，近年甚至还被人收入比较文学论文集呢。作者第二年所作的《插图之话》也是如此，从自己孩童时玩的花纸画片说到国外图书的插图。从屈原《天问》所咏庙堂壁画说到汉武梁祠石刻，等等，

内容极为丰富、生动。特别是讲到中国历史悠久的版画时，作者神采飞扬，洋溢着强烈的自豪感；讲到当时国内儿童读物之不重视插图，则态度严肃，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融知识、趣味、批评、爱国思想于一体的散文，确是不可多得的。一九三三年，他与鲁迅合作编印笺谱，负有选购笺纸之责，后作《北平笺谱序》，并有《访笺杂记》记其事。这两篇文章均得到鲁迅的赞赏，认为“序文甚好，内函掌故不少”^①，又说《访笺杂记》“是极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谱中”^②。这两篇散文，一用语体，一用白话，一隐括笺纸流传历史，一叙述笺样搜求经过，相映成趣，均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古代版画史的极深的功力，既“掌故”丰富，又生动有趣，是作者以外的散文家所写不出来的。自然，鉴赏这样的散文，需要知识层次较高的读者。

他还写过不少最赋有个性的有关求学、求书的散文，更一直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近年香港的刊物上还有人提到：“在郑振铎的论文随笔集

① 鲁迅 1933 年 12 月 2 日致郑振铎信。

② 鲁迅 1933 年 10 月 21 日致郑振铎信。